

NEW

新编大学英语

英汉互译实用教程

NEW PRACTICAL COLLEGE ENGLISH
COURSE IN 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夏增亮 赵梓男 李娜 戴军 何艳萍。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新编大学英语英汉互译实用教程 / 夏增亮等编著

.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226-04922-8

I. ①新… II. ①夏 … III. ① 英语—翻译—高等学校
—教材 IV. ①H315. 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 045076 号

出版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牟克杰

封面设计：党 杰

新编大学英语英汉互译实用教程

夏增亮 赵梓男 李娜 戴军 何艳萍 编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7.5 插页 1 字数 826 千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ISBN 978-7-226-04922-8 定 价:60.00 元

前　言

《新编大学英语英汉互译实用教程》是着眼于将语言技能与语言文化相结合，并突出实用功能的英汉互译教材。本教程首先介绍了英汉互译的基础理论知识，并对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进行了对比，然后以大量的实例介绍了翻译的基本技能，并以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方式从词、句、篇这三个层次介绍了英、汉互译中的常见问题和处理方法，在文本翻译中，本书重点涉及和介绍了与非英语专业学生今后工作相关的文体和应用文的翻译，以提高英、汉互译的实际操作能力。

本教程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力求理论与实践并重，语言知识与能力训练兼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实用性。本教程是专门为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编写的一本应用型翻译教材，适合已经完成大学英语基础阶段学习的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使用，本教程具有如下特点：

本教程从翻译的基础知识、基本技巧到实用指导逐层深入；以英译汉的学习、训练为主，兼顾汉译英，通过英汉和汉英两种语言的互译，使学习者的翻译能力得到加强。

本教程与基础阶段的教学要求衔接紧密，一些例句直接取自基础阶段的课本，而且采用了大量学生熟悉的句型，从而使教学具备了很强的延续性。另外，本教程还根据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词、句子以及段落的选择都注重同现实生活相联系，教学语言和教学材料的选择都本着实用的原则斟酌筛选；所选内容除词、句的翻译外，还将很多应用文体，特别是本科生常用的应用文的翻译涵盖其中。

本书实用性强，在理论的编写上力求全面，选编一些目前对于翻译学习所必须了解，对于翻译实践有指导作用的内容。翻译理论阐述深入浅出，适合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学习、阅读、使用。

编者在编写过程中征求了不少同仁的意见，参阅了国内外翻译方面的书籍及互联网上的相关资料，但由于此书内容覆盖面广，参考书目不能一一列出，特此向有关出版部门和相关作者表示歉意！

本教程编写的具体分工如下：第一、二、三、四章由夏增亮（兰州工业学院，约28.1万字）负责编写；第五、六章由赵梓男（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约15万字）负责编写；第七、八章由李娜（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约13.5万字）负责编写；第九、十章由戴军（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约13万字）负责编写；第十一、十二章由何艳萍（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约13万字）负责编写，本书的统稿由夏增亮负责完成。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不足、错讹之处，恳请广大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001
第一节 翻译史简介	001
第二节 翻译理论简介	005
第二章 翻译概述	009
第三章 英汉语言对比	020
第一节 英汉语言对比	020
第二节 英汉语言句式结构对比	026
第三节 英汉文化差异对比与翻译	036
第四节 英汉民族心理文化差异对比与翻译	041
第四章 翻译技巧	049
第一节 加注	049
第二节 释义	053
第三节 增词	056
第四节 减词	059
第五节 转换	061
第六节 归化	067
第七节 切分与合并	069
第五章 语词的翻译	074
第一节 英汉词义的理解和选择	074
第二节 词的引申	080
第三节 词的增译和省译	082
第四节 词的转换	088
第六章 语句的翻译	094
第一节 英语定语从句和汉语定语的翻译	094

第二节 正说与反说的转换	098
第三节 因果关系的替换	101
第四节 长难句的翻译	103
第七章 语篇的翻译	109
第一节 英汉两种语篇的特点	109
第二节 句际关系的衔接与翻译	112
第三节 句际关系的连贯与翻译	119
第四节 语篇的布局方式及翻译转换趋势	124
第五节 文化语境的翻译	132
第八章 语法与翻译	138
第一节 数、格与翻译	139
第二节 时态与翻译	142
第九章 修辞与翻译	146
第一节 修辞	146
第二节 修辞与翻译	204
第十章 文体与翻译	209
第一节 科技文本的翻译	209
第二节 新闻文本的翻译	214
第三节 旅游文本的翻译	220
第四节 广告文本的翻译	225
第五节 法律文体的翻译	230
第六节 文学文体的翻译	233
第七节 公示语的翻译	237
第八节 商务信用证的翻译	244
第十一章 应用文的翻译	250
第一节 商贸函电	250
第二节 广告及说明书	252
第三节 日常应用文	258
第四节 其他应用文的翻译	262

第十二章 机器翻译	276
附录一 汉英翻译分类词汇	285
附录二 常用谚语英汉互译	400
附录三 常用典故翻译	415
参考书目	423

第一章 绪论

翻译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语言活动,是“把一种语言已经表达出来的东西用另一种语言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范存忠:“漫谈翻译”《翻译理论与技巧》,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p.80),是“从语义到文体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谭载喜:《奈达论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p.10)。翻译虽为个体所承作,却是一种社会活动,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既有很强的理论性又有丰富的实践内涵。就前者而言,翻译经过千百年来各国翻译家的共同努力,已经在语言学、文学、文化、心理学、人类学、哲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套理论体系,并在具体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跨文化和语言转换模式。随着科学的日益进步,这种体系和模式正处在不断地完善之中。就后者而言,翻译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辩证的;翻译理论产生于翻译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实践转过来又丰富翻译理论。可以说,没有社会实践就不会有翻译理论的产生;没有翻译理论作为指导,翻译实践就会难免走弯路。因此,学好翻译既要重视翻译理论的学习,又要加强翻译实践;理论联系实际,这是我们学好翻译的必由之路。

第一节 翻译史简介

人类古代的翻译活动大都与宗教的发展密切相关。西方的翻译是从翻译《圣经》开始的,而中国的翻译则始于佛经的翻译。在这点上两者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

(一) 西方翻译史

翻译在西方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曾经出现过五次高潮,其中前三次高潮均与《圣经》翻译以及基督教与穆斯林之间的文化交流为主体。到了公元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翻译活动才逐渐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和文学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翻译则不再仅限于宗教与文学,而是深入到科技、教育、艺术、商业、旅游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翻译不再只由少数学者独领风骚,而是发展成为一种颇具魅力的职业。人们不仅对翻译的科学、艺术和技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探讨,而且发展了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的利用大大减轻了翻译工作者繁重的脑力和体力劳动。

1.第一次高潮(公元前3世纪中叶)

这个时期最著名的翻译成就有两个:

(1)《希腊文旧约圣经》据说当时有72名学者用了72天时间把《圣经》从希伯来语翻译成

希腊语,以满足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学习《圣经》的需要。

(2)《奥德赛》拉丁语译本受希腊文化的影响,罗马文学家把荷马(Homer:about 9 BC, poet of Ancient Greece)的史诗《奥德赛》(Odyssey)译成了拉丁语。同时还有一大批希腊戏剧也被翻译成拉丁语。

2.第二次高潮(公元4—6世纪之间)

西方翻译的这一次高潮与基督教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期间《圣经》的各种译本相继问世,其中杰洛米(Jerome)翻译的《圣经通用本》(The Vulgate)最具权威性。他坚持“在不损害思想的前提下,应当使译文符合译语的韵律和各种特征”,因此他的译文流畅自然,易于为读者所接受。

3.第三次高潮(公元11—12世纪之间)

这次翻译高潮持续了将近一百年时间。此间由于基督教徒与穆斯林对彼此的文化深感兴趣,有大批阿拉伯语作品被译成拉丁语,或希腊语作品被译成古叙利亚语。西班牙的托莱多因翻译活动的频繁而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

4.第四次高潮(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这个时期的翻译活动深入到了宗教、思想、政治、哲学和文学等各个领域,译作的数量、质量和类别均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德国的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将《圣经》翻译成德语,为现代德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611年,英王詹姆士一世钦定的《圣经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以语言通俗、优美和流畅而闻名于世。《圣经钦定本》被视为“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文学家阿米欧用17年的时间翻译了《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英国的查普曼则用18年时间翻译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5.第五次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这个时期的西方翻译有三个特点:(1)翻译不再仅限于宗教和文学领域,而是深入到了科技、教育、艺术、商业、旅游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翻译不再只由少数学者独领风骚,而是发展成为一个吸引人的职业。(3)人们不仅对翻译科学、翻译艺术和翻译技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而且发展了机器翻译,利用人工智能来进行翻译,大大减轻了翻译者繁重的脑力和体力劳动。

(二)中国翻译史

中国的翻译也有两千多年历史。有记载的翻译活动始于西汉哀帝(公元前6—2年),当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来中国口传简短的佛经经句。东汉时期,天竺人摄摩腾、竺法兰翻译《四十二章经》,这是我国现存佛经中最早的译本。到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波斯人安世高来中国,翻译佛经达30多部。东晋时期在历史上称苻秦时代,译经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东晋前秦时朝廷设置了译场,由高僧释道安(313年—385年)为译场主持。在他的监译下翻译了《四阿含》、《阿毗昙》等。后秦时则请印度高僧鸠摩罗什来中国译经。由此可见,中国的翻译活动是从佛经的翻译开始的。

一些翻译界学者认为,中国的翻译事业迄今已经历了五次大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

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和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

1.两汉至唐宋的译经时期

从两汉至唐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传统的儒、道糅合。伴随着佛经的翻译入传，印度的哲学、文学艺术对我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的医学、天文、算术乃至语言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佛经翻译对于发生在我国的中西文化第一次大碰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还是以传播宗教为主。虽然在佛经译著中也夹带有少量描述外国科学知识的书籍，但不能说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科学翻译活动。因此这一时期的科学翻译充其量只能是宗教翻译的附庸。

两汉至唐宋时期一批著名的译者就翻译方法发表了不少论说，初步构筑了中国早期的翻译理论。例如，释道安主张直译，译文不增不减，只是在词序上作些调整；鸠摩罗什则倾向于意译，常对原文加以改动，以适应中国的文体。他们关于翻译方法的主张，对我国后来的翻译理论发生过持久的影响。比如清代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就可从这一时期的翻译方法的论说中找到渊源。

中国翻译史上有“译经三大家”的说法，指的是：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

(1) 鸠摩罗什(344年—413年)：东晋后秦高僧，他和弟子僧肇翻译了《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和《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评论说，鸠摩罗什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说明在译文中仍然可见原作之神情。鸠摩罗什的译文为我国的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

(2) 真谛年代：南北朝时，印度佛教学者真谛应梁武王之聘来到中国，译经达49部，其中《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甚大。

(3) 玄奘(602年—664年)：唐高僧，俗称唐僧。贞观二年(公元826年)，玄奘去印度求经，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玄奘主持了更大规模的译场，用19年时间译经75部1335卷。此外，他还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语，是第一个把汉语著作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人。唐代之后，译经在中国虽不曾中断，但规模均无法与唐代的盛况相比。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时期

明代万历年间，徐光启与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标志着中国译著的方向性转变。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朝廷主要是出于修历的目的，对翻译西方历算书籍感兴趣。1629年朝廷设立了历局，组织传教士与我国历算知晓人士系统编译数学和天文书籍。徐光启、李之藻和王征等有识之士，一方面自身喜爱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则力图以科学技术改变我国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奉旨参与历局译书之外，还翻译了西方几何、测量、算学、农业、水利、机械及哲学等有关书籍。

明末科学翻译活动启动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第二次大接触。明末科学翻译是中国少数有识之士企图冲破长期封建保守与夜郎自大的氛围，自觉睁眼看世界之始，不仅与西方传教士热衷传教的翻译目的不同，还不断面临保守官吏顽强的阻力。由于朝廷支持不够，

译人不足,民间翻译出版机构尚未形成,致使当时已传入我国的一大批西方书籍未能得到译传,使我国错过了一次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极好机会。

严格地说,清初的科学翻译活动主要是围绕康熙皇帝的个人兴趣开展的。他利用传教士翻译了少量关于天文装置、历表及地理、数学等书籍。但这些译稿仅束之内廷高阁,对民间丝毫未产生影响。清初中国翻译唯一有影响者是薛凤祚。他与传教士穆尼阁合作,翻译了一些有关对数、天文和三角方面的书籍,使这些知识在民间得以及时传播。

3. 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时期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译著方面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林纾和严复。林纾(1852—1924),字琴南,光绪年间的举人。他与一些英美人士合作,译出欧美文学名著达160多部。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有趣的是林纾不懂英文,是由他人口述给他听,然后由他笔录并整理出来。林纾的译著中遗漏删减之处甚多,但可读性很强,对介绍西方文学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译作第一次使中国读者接触到西方文学作品,引起了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同时也打破了章回小说的旧格式,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严复(1853—1921),字又陵,是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大家。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到宣统三年,严复潜心译书,译作多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学说,显然有向国人介绍西方进步思想之意。所以,严复又被称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译著主要有《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意》(L'esprit des Lois)、《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es)、《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和《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严复提出的“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翻译标准,流传至今近百年仍为许多译者所推崇,可见其生命力之强。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前期,我国的翻译活动为马列主义和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马列主义经典《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陈望道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李达译),世界文学名著《莎士比亚剧本》(梁实秋译)和苏联文学作品《死魂灵》、《毁灭》(鲁迅译)。该时期译作的典型特征是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从而使东西方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扩大到了语言学、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范畴,为我国翻译理论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翻译事业的成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毛泽东选集》。我们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翻译水平大大提高,对翻译的标准也达成了共识。我们把外国的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也把中国的国情和发展情况介绍到国外。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之前,屈指算来17年,实际上真正繁荣的也就是五十年代。那十年的翻译工作,重点放在译介东西方的文学作品上,所译作品的数量远远比不上今天。

但由于组织得力,狠抓了计划译书和提高翻译质量两个环节,因而译文质量普遍较高,涌现出一大批名著名译。

5.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

从七十年代开始至今仍然方兴未艾的这一次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范围、质量水平还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大大超过了五十年代。我国的翻译队伍已不是那时候的数以千计,而是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数十万人的大军。他们所投身的翻译领域已不是文学艺术的“一花独放”,而是社科、科技、军事、外交、贸易、法律、文教、卫生等领域“全面开花”,在世界文化史上堪称首屈一指。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在今日的“地球村”,离开翻译来谈论知识和信息,是不可思议的。此外,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中国若想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与其他国家在学术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而这些合作与交流活动都离不开翻译。

第二节 翻译理论简介

(一)早期西洋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史的另一个侧面是翻译理论的发展。同其他的领域的活动一样,翻译并不依赖理论而存在,然而,翻译的实践总是引出理论并推动理论的进步,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

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他首次把翻译区分“作为解释员”(ut interpres)和作为演说家(ut orator)的翻译。西塞罗是从修辞学家、演说家的角度看待翻译的。所谓“作为解释员”的翻译是指没有创造性的翻译,而所谓“作为演说家”的翻译则是指具有创造性、可与原著媲美的翻译。这样,西塞罗便厘定了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从而开拓了翻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园地。自西塞罗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史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accuracy)与不准确(inaccuracy)的问题向前发展。

继西塞罗之后,西方翻译史拥有一大批优秀的翻译理论家。他们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在古代,除西塞罗的直译和意译的两分法外,还有昆体良的“与原作竞争”和哲罗姆的“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之说;有奥古斯丁的《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和他的有关语言符号理论。在中世纪,有波伊提乌的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主张和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的客观主义观点;有但丁的“文学不可译”论。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伊拉斯莫的不屈从神学权威、《圣经》翻译靠译者的语言知识和路德的翻译必须采用民众语言的人文主义观点;有多雷的译者必须理解原文内容、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字对译、采用通俗形式、讲究译作风格的“翻译五原则”。在十七至十九世纪,有巴托的“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译文必须“不增不减不改”的准确翻译理论;有

德莱顿的“直译”、“意译”、“拟作”的翻译三分法和翻译是艺术的观点；有泰特勒的优秀译作的标准；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备的通顺等翻译三原则；有施莱尔马赫的口译和笔译、文学翻译与机械性翻译的区别；有洪堡的语言决定世界观和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理论；有阿诺德的“翻译荷马必须正确把握住荷马特征”的观点。在二十世纪，有费道罗夫的翻译理论首先需要从语言学方面来研究、翻译理论由翻译史、翻译总论和翻译分论三部分组成的观点；有雅克布逊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的三类别；有列维的“翻译应为使读者产生错觉”、“翻译是一种作决定的过程”和加切奇拉泽的“翻译永远是原作艺术现实的反映”、“文艺翻译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文学翻译理论；有弗斯、卡特弗德的翻译在于“语言环境对等”的语言学翻译理论；有奈达的“等同的读者反应”和“翻译即交际”的理论。可以说，所有这些主要观点都是构成西方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另一个侧面说，西方翻译理论主要由两条不同的线构成。一条是文艺学翻译线。这是一条最古老的线，从泰伦斯等古代戏剧翻译家一直延伸到现代翻译理论家（捷克）列维和（苏联）加切奇拉泽。按照这条线，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文学艺术，翻译的重点是进行再创造。理论家们除不断讨论直译和意译、死译与活译的利弊外，对翻译的目的和效果也进行了分析。他们强调尊重译入语文化，讲究译文的风格和文学性，要求译者具有天赋的文学才华。另一条线从古代的奥古斯丁延伸到二十世纪的结构语言学派，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线。它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认为翻译旨在产生一种与原文语义对等的译文，并力求说明如何从词汇和语法结构上产生这种语义上的对策。这两条线都各有其偏颇之处。文艺学翻译理论强调翻译的目的和结果，从宏观上强调译文的艺术效果，不甚研究翻译的实际过程和语言的使用技巧问题，也忽略非文艺作品的翻译和文艺作品翻译中的非创造功能。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缺陷是，不甚注意作品的美学功能，忽略文艺作品的艺术再现，理论分析往往局限于单个的词、句子或语法现象，而忽略话语结构这一更为广泛的内容。直到最近十年来，随着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入，这种缺陷才开始有所修正。

从发展的趋势看，语言学翻译理论线已占据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主导地位。理论家大都一致认为，翻译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是应用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是应用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与语义学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又与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控制论、信息论等多种科学有关。必须看到，不论是文艺学翻译理论还是语言学翻译理论，它们乃是相辅相成的。翻译既不是在所有时候都是创造性、文学性的，也不是在所有时候都只是传递客观信息的。尤其重要的是，翻译理论的研究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以指导翻译实践、揭示翻译活动的客观的和内在的规律为其唯一的目的。否则，翻译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命力。

（二）中国翻译理论简介

中国翻译理论，从时间上看，可以分为传统、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在中国，传统的翻译

理论是指不以西方“现代语言学”为方法论的翻译理论研究，其具体又可以分为“发生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转型期”等。这四个时期分别见证了中国的几大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及“五四”新文学翻译。

一、发生期：所谓中国翻译理论的“发生期”是指传统译论从无到有的时期，它以支谦224年的《法句经序》为肇始，而以988年的《宋高僧传·译经篇》为结束。发生期的翻译理论建立在佛经翻译的基础上，它对于哲学、宗教、文学、音乐和舞蹈都有很大影响。发生期重要的翻译理论有如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颜宗的“八备说”、鸠摩罗什的“意译”主张等。

二、发展期：发展期是指传统翻译理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这一时间中，译论家开始思考翻译的社会功能，其分别以1604年徐光启对译书目的论述及1894年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为起止时间。这一时期翻译的多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书籍，借以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发展期的一大典型特征便是中外翻译家的合作，期间所涌现的外籍翻译家有庞迪我、高一志、罗雅各和艾儒略等。

三、成熟期：成熟期是指传统翻译理论的完善时期，具体表现在：翻译思想日臻充实完善，表达方法日益精密得当。成熟期所对应的乃是西学翻译与五四新文学翻译，以1898年严复的《天演论》为标志，其代表性的译论有如严复的“信、达、雅”、林纾的谈译书之难、金岳霖的“译意”与“译味”、郑振铎的“文学可译”、矛盾的“文学翻译创造论”、鲁迅的“信译”、傅雷的“神似”与钱钟书的“化境”等。成熟期的翻译理论研究有几个特点：翻译理论倾向的文学性质、团体论争的精彩纷呈，如严复与梁启超等关于翻译的文体、语言的论争；胡适、刘办农等对严复、林纾的批评等；一大批大翻译家及文学家的出现，如严复、矛盾、鲁迅、朱生毫等。

四、转型期：转型期是指传统译论的核心问题开始转移的时期，主要对应于新中国的成立至语言学翻译研究期间的翻译理论。这一时间的翻译理论相对比较贫瘠。

按照现在的观点，传统翻译研究乃是所谓“古典文论学派”。传统的翻译研究，仍然只关心译作的文学性和译文的选词造句等方面的问题，理论上没有突破。传统翻译研究着眼的乃是翻译的本体性研究，而非主体性研究，它强调文本内结构与意义的转换，主张指涉文本自身的“内向性忠实”，其基本的理论命题有如写作与翻译的等级喻说、翻译的价值中立、语言的透明性，以及语言规律(或文本文内结构)对于意义的预设等。这一点既解释了王宏印等提倡重释“古典文论学派”的主张，又解释了林克难、罗新璋、吴立诚与王东风等对于传统翻译研究的不断批评。作为具有典型规范性特征的“古典文论学派”翻译理论其典型缺陷在于它的演绎式研究模式，即以点代面，将某些基于经验和语言分析的论断的作用普泛化。中国传统译学“带有明显的封闭性”，缺少开放、综合和跨学科系统性；其次，传统译学缺少基本的翻译理论体系；第三，传统译学囿于传统美学的方法论，强调总体把握和模糊形象思维，缺少精确分析和严谨的科学论证。“译论界常常陷入诠释性争论”，缺乏“对策性及理论应有的实践意义”(刘宓庆，1990: iii—v)。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国内开始摆脱翻译理论研究的这种传统，并开始了历时三十年

的西方当代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介绍与研究。此间,学界所关心的主要还是翻译的技法、英、汉双语在技术层面的比照、九十年代末期之前,这种方式甚至一度规约着翻译文本与翻译教学研究乃至翻译著作的述评,造成了翻译研究与批评在理论性上的局限与偏颇。

步入九十年代后期,国内如赵家琪(1996)、韩加明(1996)、刘军平(1997)、罗选民(1997)、林克难(1998)、张美芳(1998)以及仲伟合(1999)等开始提及西方当代翻译理论体系中有关“多元系统说”、“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等理论字眼,算是对于西方当代翻译理论自觉研究的肇始。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张美芳(2000)、孙会军(2000)、马会娟(2001)、张德让(2001)、蔡新乐(2001)、傅勇林(2001)、佟立(2001)、林克难(2001)、张南峰(2001)、孟翔珍(2002)、廖七一(2002)、闫建华(2002)、刘亚儒(2002)、刘勇(2002)、葛校琴(2002)、刘艳丽(2002)与王东风(2003a,b)穆雷(2003)、孙艺风(2003a,b)、王友贵(2003)、蒋晓华(2003;2004)、王东风(2004)、刘军平(2004a,b)、徐来(2004)以及张景华(2004a,b)等无疑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2005年,《中国翻译》更是另辟专栏探讨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六十年代之前的中国翻译理论乃是中国本土所生发出的翻译理论,而六十年代之后的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就其整体而言却是对于“舶来品”的形式多样的消化。

廖七一教授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中指出,传统翻译理论时期的中国对于几本没有对于外国翻译理论著作的译介。翻译作为人类带有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必然有许多共性或规律,各民族必然积累了可以相互启发和借鉴的经验,无视或鄙视国外译论并不符合吸收人类一切有用的文化成果的精神。许钧先生说得好:“实际上,从我国目前的译论研究状况来看,我们对国外的译论了解和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太片面了。”

毋庸讳言,中华民族有十分灿烂的文化交流史,曾经涌现出无数闻名世界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从玄奘到严复,从林纾、鲁迅、瞿秋白到傅雷,他们的翻译和翻译思想“至今仍有方法论和价值论的生命力”(刘宓庆,1990:iii)。但是,在肯定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西译论因其不同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习惯形成了彼此相异的译论体系。西方翻译理论有着严格的方法论、精确的理论描述、细腻和定性定量的分析。战后西方翻译研究更是欣欣向荣,翻译流派异彩纷呈,翻译大家层出不穷,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研究角度日新月异。译介和引进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成果,加强中西译论的交流与对话,无疑对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大有裨益。

第二章 翻译概述

我国早期典籍《周礼·秋官司寇》篇里就有“象胥”(谓通言语之官)这一名目,唐朝贾公彥所作的《义疏》里提到“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这条注疏,关于翻译的定义,足以给人不少启发。用现代文艺理论和语言理论,也许可以诠释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换易成另一种语言文字,而并不变更所蕴含的意义,或用近年流行的术语说,并不变更所传递的信息,以达到彼此沟通、互相了解的目的。

一、关于翻译

何谓翻译?关于翻译的定义很多。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根据《剑桥语言百科全书》,“翻译”这个中性术语是指将一种语言(“原语”)里的词句的意思转变为另一种语言(“目的语”)的意思所做的一切,不论其手段是说话、写字还是做手势。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认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奈达论翻译》,1984)有人把翻译看作是一门科学(science),因为它有自身的规律可循;有人看作是一门艺术(art),因为它是译者对原文再创造的过程;也有人看作是一门手艺(craft),因为原语的信息需要用地道恰当的目的语再现。在自动化数据处理中,翻译又被定义为:“将计算机信息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或将字符从一种表示转换成另一种表示。”(《现代科学技术词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是,在经济和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翻译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

翻译是国际间理解的钥匙,据说西欧的文明归功于翻译者(据L·G·凯里 1979)。季羡林教授也说,翻译是永葆中华文明青春的万应灵药。中国驻联合国前代表凌青先生说,从中国来讲,没有翻译工作,就没有中国近代的革命运动,就没有中国成功的对外开放和四个现代化;从世界范围来讲,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和平,就没有各种国际交往,就没有一个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的未来。中国加入WTO后,翻译的重要作用就更是不可忽视。经济竞争是在交际中进行,而没有翻译在场,交际就很难进行,交际不成,生意就做不成。因此,翻译的作用,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关于翻译的种类可以从下面几个角度来划分:

- (1)从原语和目的语的角度来看,翻译可分为本族语译为外语,外语译为本族语两大类。
- (2)从翻译的手段来看,可分为口译、笔译、手势翻译和机器翻译。
- (3)从翻译的内容来看,可分为文学翻译、政治翻译、科技翻译和应用文翻译等。
- (4)按其处理方式来分,又有全译、摘译和编译等。

不同种类的翻译,有不同的要求。

总之,翻译是一门跨学科的专业,翻译教学也不能等同于外语教学,它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学。既要学习理论知识又要重视实践。没有足够的翻译实践,学理论如隔靴搔痒,而没有一定的理论知识指导,翻译实践的水平也难以提高。翻译课的目的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际翻译能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光靠课堂传授知识是不够的,学生应该自主学习,积极参与翻译实践才行。

二、为什么可能有翻译

翻译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需要,因为人类社会要发展进步就需要在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进行沟通,而这一全过程都离不开翻译。正如Steiner和张培基所说的那样:Translating it is that open the window, to let in the light;that break the shell,that we may eat the kernel.(Steiner)翻译是沟通各族人民的思想,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交流的重要手段,也是进行国际斗争的必要武器。翻译是学习好外语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探讨两种语言对应关系的一门学科。(张培基等)

社会的需要首先决定了翻译的可能性;其次,尽管人类处理主观和客观世界的具体方式因受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而不完全相同,但各民族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存在着广泛的一致,人类的语言生成和转换能力也毫无二致,因此,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达出来是完全可能的。

三、翻译的性质

什么是翻译?回答这个问题由于人们认识的角度不同,所以答案也就不一。有人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有着自己的内在科学规律;也有人视翻译为一门艺术,因为翻译好比作画,先抓住客观人物的形态和神态,然后用画笔把它惟妙惟肖地表现在画上;还有人将翻译认作是一门技能,因为就其具体操作过程而言总是离不开方法和技巧的。但是总的看来,翻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因为它集语言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信息理论等学科之特点于一身,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已经拥有了它自己的一套抽象的理论、原则和具体方法,形成了它自己独立的体系,而且在相当一部分的语言材料中这些方法正在逐渐模式化。由此可见,视角的不同可以导致对翻译性质认识的差异。下面是部分翻译理论家对翻译的定义,由此可见人们在翻译性质认识上的差别:

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Nida)
Translation may be defined as follows: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 (SL)by equivalent textual material in another language.(TL).(Catford)

Transla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parole of one language is transferred into the parole of another with the content i.e. meaning unchanged.(Barhudarov)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郭沫若)

Translation is first a science,which entails the knowledge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facts and

the language that describes them—here, what is wrong, mistakes of truth, can be identified; secondly, it is a skill, which calls for appropriate language and acceptable usage; thirdly, an art, which distinguishes good from undistinguished writing and is the creative, the intuitive, sometimes the inspired, level of the translation; lastly, a matter of taste, where argument ceases, preferences are expressed, and the variety of meritorious translation is the reflection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Newmark)

四、翻译的类别

既然翻译的性质可从不同的角度来定义,那么同样翻译的种类也可从不同的视角来分类。一般说来,翻译可从5种不同的角度来分类:

- (1) 从译出语和译入语的角度来分类,翻译可分为本族语译为外语、外语译为本族语;
- (2) 从涉及的语言符号来分类,翻译分为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 (3) 从翻译的手段来分类,翻译可分为口译(oral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笔译(written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和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
- (4) 从翻译的题材来分类,翻译可分为专业文献翻译(translation of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文学翻译(literary translation)和一般性翻译(practical writing translation);
- (5) 从翻译的处理方式来分类,翻译可分为全译(full translation)、摘译(partial translation)和编译(translation plus editing)。

五、翻译标准

翻译标准就是指翻译实践时译者所遵循的原则,也是翻译批评家批评译文时必须遵循的原则。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翻译标准则是从中产生的。由于社会活动受制于社会条件及译者个人等等因素,因此翻译标准也就打上了深深的社会和译者的烙印。总的说来,翻译标准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

任何翻译实践总要遵循一定的翻译标准或原则,衡量一篇译文的好坏同样也离不开一定的翻译标准,因此翻译标准的确立对于指导翻译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人们看待翻译的角度不同,自然有了不同的翻译标准。概括起来,它们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类:

- (1) 以译出语或译入语为取向的翻译原则(the source-language-oriented or the target-language-oriented translation principle)

以译出语为取向的翻译原则唯原文的形式是举,唯恐译文失真,有违原文作者的原意,因此翻译时完全采取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and line for line)的死译方法,而且常多用音译法。例如把the Milky Way(银河)直译为“牛奶路”,把the apple of my eye(珍爱物;珍爱之人,宝贝)直译成“我眼中的苹果”;把“Every dog has its day.”译为“每只狗都有它的日子”(正确的译法应为“人人皆有得意之日”)。持这种原则的翻译家为数不少,如中国西晋时期的佛经翻译家竺法护(约230–309)、15世纪德国翻译家尼古拉斯·封·维尔(Nicolas von Wyle,生卒年不详)、近代的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而以译入语为取向的